



西夏建张掖龙王庙史迹考述^{*}

崔云胜

摘要:始建于西夏的张掖黑河龙王庙,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和黑河流域民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承载者许多历史信息,诸如当地的民族、信仰、行政机关、农业生产等。比如立于下龙王庙的西夏皇帝李仁孝敕谕黑河诸神碑记载西夏皇帝李仁孝曾亲临黑河桥,躬祭龙神等诸神以祈求“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体现出西夏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当地经常发生的是水灾而不是旱灾。这和后世明清时期水源紧张、旱灾频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键词: 西夏 张掖龙王庙 史迹

河西是西夏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土壤肥沃,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西夏王朝非常重视张掖地区,专设镇夷郡进行管理,也非常重视张掖地区的农业生产,张掖龙王庙的兴建便是西夏王朝在张掖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佐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张掖龙王庙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逝。中国传统以农业立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封建社会,人们在兴修水利的同时,许多农业区逐渐兴起了对主管兴云降雨的龙神的信仰。在干旱缺水时,祈祷龙神大发慈悲,布云降雨;在雨季河水泛滥成灾时,又祈祷龙神退水保民。这种情况,在黑河流域的张掖地区,概莫能外。

在张掖,沿黑河两岸,大的龙王庙有三座,分别称之为上龙王庙、中龙王庙、下龙王庙。据《重刊甘镇志·建置志·祠祀》载:

龙王庙。有三,一在城西南八十里,张掖河水经流处,旧名河渎神庙,前有水涡,入小出大,莫测浅深,岁旱祷雨辄应。一在西南二十里。一在城西八里,元季兵燹,洪武二十五年重建。^①

《甘镇志》并未说明这三座龙王庙建于何时,而《甘州府志》则明确说建于西夏:

上龙王庙。城西南八十里,张掖河水经流处,旧名河渎神庙。前有水涡,入小出大,莫测浅深,旱祷辄应。西夏时建,历久倾圮。明巡抚杨博重建,有碑记。我朝乾隆二十四年,知张掖县王廷赞重修正殿,增山门、寝殿、廊坊,献“甘民衣食源”五字匾额。给龙首渠等处荒田六顷,分半作龙王香火,分半作书院膏火,详《碑记》。

中龙王庙。城西三十里,西夏时建,元末毁。明洪武嘉靖年递修。我朝康熙八年,靖靖逆侯张勇重修,分巡道袁州佐作合祀碑记。

^{*} 本文获得河西学院校长基金项目“明清河西文化研究”资助。

^① 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下龙王庙。城西十余里，西夏乾祐七年，夏主李仁孝有敕谕碑。元末燹，明洪武中建，嘉靖二十五年，巡抚杨博有《祈雪文》，二十七年有《祈雨文碑记》。我朝康熙四十年，乡民重修，提督王进泰献额，各记载《艺文》。^①

下龙王庙始建于西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下龙王庙元末毁于兵火，明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重建，且立有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西夏皇帝李仁孝敕谕黑河诸神碑，《重刊甘镇志·地理志·水利》载：

黑河桥。城西十三里。按夏主乾祐七年敕黑河诸神之文曰：“昔贤觉圣光菩萨兴建此桥，免徒涉之患，朕曾亲临此桥。今载启精度，冀神威力，水患永息，桥道久长。”立石于龙王庙中。^②

上龙王庙应该也是建于西夏。据明天顺元年（1457年）牟伦《修上龙王庙碑记》，“张掖西南七十里许，有庙焉，相传以为黑河龙王之神祠也。水旱札槎，祷无不应，几百年矣”。^③明代天顺元年相去西夏尚不太远，所以牟伦对上龙王庙始建年代的推测当是可信的。“几百年”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假如说是300年的话，其始建年代是公元1157年，正当西夏中期，如果以400年计，其始建年代是1057年，正当西夏初期。关于中龙王庙，清袁州佐《重修中龙王庙合祀碑记》载：“张掖龙神之建，遐无所考，余尝访自故老，披阅诸旧志，爰知构宇设像，昉自大夏乾祐七年二月间。分为上、中、下三处：一在城西南八十里，一在西南二十里，一在城西八里。”^④碑立于康熙八年（1669年）。袁州佐张掖上、中、夏龙王庙始建于西夏乾祐七年二月间的说法太过武断，明天顺元年牟伦《修上龙王庙碑记》不敢断言上龙王庙始建于乾祐七年间，《重刊甘镇志》亦不说龙王始庙建于何时，李仁孝敕黑河诸神碑立于“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并未说下龙王庙建于何时，晚至清康熙八年的袁州佐怎么知道上、中、下龙王庙始建的确切时间呢？袁州佐说他曾“披阅诸旧志”，不知他到底批阅了哪些旧志。案，《明史》载，明代河西方志，主要有包节《陕西行都司志》十二卷，郭伸《甘州卫志》十卷，^⑤现均已不存。现存世的成书于康熙以前的地方志有三部，分别是顺治年间重刊的《肃镇志》、《重刊甘镇志》、《凉镇志》。《陕西行都司志》、《甘州卫志》袁州佐恐怕看不到，因为经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公署册案，悉被焚烧”，^⑥他能看到的，恐怕只能是《肃镇志》、《重刊甘镇志》、《凉镇志》这三部。其中，《肃镇志》记载今酒泉市的历史，《凉镇志》记今武威市的历史，而《甘镇志》又不载龙王庙建于何时，故，中龙王庙始建于西夏只能算是推测。

立于下龙王庙的西夏皇帝李仁孝敕谕黑河诸神碑是一件珍贵的西夏历史文物，现藏张掖市博物馆（大佛寺）。该碑正面刻汉文，阴面刻古藏文，书写的是西夏皇帝李仁孝的敕文，这是一件重要的西夏历史文献。为便于说明问题，现据王尧先生《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一文将汉文碑铭内容转录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显隐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发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护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度，幸冀汝等诸神灵廓慈悲之心，恢济度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

① 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点《甘州府志》卷5，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② 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第81页。

③ 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点《甘州府志》卷13，第549页。

④ 同上，卷14，第594页。

⑤ 《明史》卷97《艺文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410页。

⑥ 杨春茂《重刊甘镇志序》，见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第5页。

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

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 主案郭那正成、司吏骆永安 笔手张世恭书、写
作吏安善惠刊 小监王延庆 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①

这篇敕文，不仅与今甘肃临泽县板桥镇一带的民间宗教“平天仙姑”信仰有直接关系，^②而且包含着当时西夏许多重要事情的相关信息，比如：碑文阴面刻古藏文而不是西夏文，反映出在甘州，藏族人有相当大的数量，同时也反映出西夏统治者也崇信喇嘛教；碑末署“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可以纠正《宋史》、《西夏纪事本末》两书记载的关于乾祐改元年代的错讹；碑中指甘州为镇夷郡，可以印证西夏升甘州为镇夷郡的事实。^③就农业生产而言，张掖地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敕文说，西夏皇帝李仁孝以九五之尊亲临黑河桥，躬祭龙神等诸神，希望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体现出西夏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临泽板桥一带并不缺水，经常发生的是水灾而不是旱灾，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尚不够大。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是党项族，党项族是游牧民族，故而在西夏畜牧业具有传统优势，畜牧业是西夏王朝的支柱产业，农业虽然很受重视，但其地位毕竟次于畜牧业。这和明清时期水源紧张、旱灾频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杨博任甘肃巡抚都御使，该年冬天，干旱少雪，遂至龙王庙祈雪。在《祈雪文》中，他先自列罪状，向神灵承认罪过，希望龙神等大发慈悲，兴云降雨，他说：“博以冬旱滋甚，不敢径渎明神。……意者博为宪臣，诸属之中有墨而弗率者，博不能纠正之，与夫虎兕出柙，噬人于白昼大都之中，是诚典守者之过也。……惟神聪明正直，一呼而云集，一鼓而雷动，域中亦何爱而弗年我民也？博情隘词迫，罔知所裁。”^④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又有《祈雨文》，其中说：“去岁淫雨为灾，今岁自春正月至夏四月又复不雨，极备极无，凶沴频仍，是皆博等奉职无状所致。……语云：‘疾痛呻吟，必呼父母。’用是不避靦颜，仰于神造，惟神念之佑之。”^⑤无独有偶，巡抚都御使陈玘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甘泉祠《谢雨文》、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佑善观《谢雨文》是陈玘在甘泉祠龙神庙祈雨应验之后对龙神、对“北极真武元天上帝”的感谢之文。^⑥

时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王朝以河西为跳板，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的叛乱，经营新疆，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屯田。屯田使得大量土地被开垦出来，促使了包括张掖在内的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水源的紧张局面，用水不足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在康熙末期，发生了著名的水案“阎如岳案”。“阎如岳案”的经过是这样的，镇夷堡（今高台县罗成乡一带），“头水毕，上游之水被张（指今张掖县）、抚（即抚夷厅，今为临泽县）、高（指高台县）各渠拦河阻坝，河水立时枯竭。直待五、六月大雨行时，山水涨发，始能见水。水不畅旺，上河竭泽，此地禾苗，大半土枯

① 白滨《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5~466。

② 请参阅拙作《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③ 参阅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见白滨《西夏史论文集》第468~471，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建置志·祠祀》第191~192页。

⑤ 同上，第192~193页。

⑥ 甘泉祠又名甘泉庙，在甘州城南门内，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杨博培基建祠，分泉于垣之两翼，为文流、武派，后有池会合，额“文武一道坊”。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张掖县知县王廷赞重修，三十八年（1773年）张掖县陶士麟率士绅陈法言等修了泮池桥梁，四十三年（1778年）张掖县知县陈澍率士绅陈瑜等补修了月台、耳楼。佑善观，在甘州城内西北隅，旧名玄真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都督宋晟建。永乐己丑（1409年）士人刘得衡等建三清殿、通明阁。大学士杨荣碑记（碑记见《重刊甘镇志·建置志·祠祀》）中说：“洪武辛未岁（1391年）暮春三月，震方初动，郡人闻西北边鼓声震者三。俄而，飙风飒至，沙石俱起，玄云昼晦，又闻空中乐声飒飒然。日亭午，风止云散，天宇晴朗，忽见西北出台址一所，中若有物然。急趋视之，得一木主，题曰：‘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其背则书‘至正九年九月九日，脱罕丞相喜舍’。不知自何而至，盖鬼神所移者。”众人感到奇异，认为神灵将安位于此以庇佑甘人，应当兴建官观进行祭祀。于是，刘得衡偕乡老钱谷英带头，禀告总兵都督宋晟，在其地建成玄真观，“严其祀事。自是而后，雨暘顺序，年谷丰稔，边尘无警，兵以获宁。凡有所祈靡不响应”。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北方属水，故“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便自然是主管水的神灵。

而苗槁矣”。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镇夷堡生员如阎岳，不忍当地民众坐以待毙，不避艰险，将此情形控诉陕甘总督年羹尧，经查明定案：在每年的芒种前十日，委托安肃道道台，亲赴张、抚、高各渠，封闭渠口十日，使得河水下流，浇灌镇夷五堡及毛目二屯（今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田苗，“十日内不遵定章，擅犯水规渠分，每一时罚制钱二百串文，各县不得干预”。^① 在这种情况下，干旱时节，向龙神祈雨便成为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活动，人们对龙神的崇拜愈加强烈，西夏时所建的龙王庙自然一再得到扩展和重修。袁州佐《重修中龙王庙合祀碑记》载，康熙六年（1667 年），甘州发生旱灾，阖城士民请求时任甘肃提督的张勇到龙王庙祈雨。“公素以民命军需为念，遂捐洁输诚，现移请上下龙神于中庙，捐金祭赛间遂降甘霖，一时民望咸苏，讴深比户。”张勇看到龙王庙“柱础墙垣飘摇倾圯，且旧址狭隘”，遂予以拓展重修。^②张掖县知县王廷赞《重建黑河龙王庙碑记》载：“乾隆丁丑，予钦奉简命来宰斯邑，惟时军兴旁午，诸务倥偬。乃自春徂夏，雨泽既微，而河流复弱，万姓嗷嗷，实堪恻。爰偕提、府两宪，躬诣神祠，虔行祷祝，不旋踵而河流涌发，甘露滂沛，盖神之灵爽，实如式凭云。”他看到上龙王庙庙貌狭小，遂召集士民予以扩展重修，并“择龙首堡荒芜田若干亩以作香火地”，发给执照。^③

从以上考述可以看到，西夏时期所建黑河流域的龙王庙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和黑河流域民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承载者许多历史信息，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发掘。

（作者通讯地址：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武威 734000）

① 《光绪六年重修镇夷龙王庙碑》，载民国徐家瑞《新纂高台县志》卷 8《艺文下》，张志纯等校点《高台县志辑校》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450 页。

② 钟庚起著，张志纯等校点《甘州府志》卷 14，第 594 页。

③ 同上，第 595~596 页。